



海峡两岸抗日小说 比较研究

陈颖 | 等著



人民出版社

海峡两岸抗日小说 比较研究

陈颖等著

责任编辑:詹素娟

封面设计:彭世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峡两岸抗日小说比较研究/陈颖等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7

ISBN 978-7-01-015033-8

I. ①海… II. ①陈… III. ①海峡两岸—小说研究—对比研究

IV. ①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53958 号

海峡两岸抗日小说比较研究

HAIXIA LIANGAN KANGRI XIAOSHUO BIJIAO YANJIU

陈颖等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8.75

字数:300 千字

ISBN 978-7-01-015033-8 定价:56.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谨献给
七十多年前为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
而献身的海内外中华儿女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绪论: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与海峡两岸抗日小说创作 / 1

上 篇

总论:海峡两岸抗日小说创作的世纪回眸

第一章 战时两岸抗日小说创作 / 15

第一节 民族的共同屈辱:两岸作家对于甲午战争的小说叙事 / 15

第二节 民族的共同命运:基于共同民族意识的不同反抗形式 / 18

第二章 战后两岸抗日小说创作 / 47

第一节 “光复”初期两岸文学交流的“昙花一现”及抗日小说创作 / 47

第二节 两岸对峙时期的抗日小说创作 / 53

第三节 两岸关系的缓和与抗日小说创作的“一枝独秀” / 101

下 篇

分论:海峡两岸抗日小说创作之典型现象类析

第三章 海峡两岸乡土抗日小说 / 133

第一节 创作母题比较 / 133

第二节 人物形象比较 / 161

第四章 海峡两岸史诗抗日小说 / 176

第一节 创作背景比较 / 179

2 海峡两岸抗日小说比较研究

第二节 叙事策略实例比较 / 194

第三节 价值观差异下的叙事比较 / 213

第五章 海峡两岸军政抗日小说 / 228

第一节 政治格局的此消彼长和文艺政策的殊途同归 / 228

第二节 两岸军政抗日小说之同题异构 / 231

余论:战后 70 年两岸对抗日历史认知的差异及对文学创作与研究的
影响 / 263

附录一:论丘东平的抗战军魂小说 / 270

附录二:台湾抗日小说的一道奇异景观

——台籍原日本兵的南洋战争见证叙事 / 277

参考文献 / 289

后 记 / 293

绪论：中华民族的抗日斗争与海峡两岸 抗日小说创作

东亚岛国日本，东临浩瀚太平洋，西毗广袤东亚大陆，国土南北狭长形如长虫。由于受限于狭小的领土和匮乏的自然资源，日本早有向外扩张的野心。明治维新后日本国力迅速增强，其对外扩张国策开始付诸行动。1879年琉球王国被日本吞并，日本初尝了对外扩张的甜头。眼看强邻中国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合力轰击下国门洞开国力渐衰，日本急欲在列强瓜分中国的豪取强夺中分一杯羹，遂于1894年利用朝鲜东学党内乱之机入侵朝鲜，引发了中日甲午战争，1895年迫使战败的清政府割让台湾为日本殖民地；1910年日本实现了对朝鲜的完全占领，初步形成了对中国的包围；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军国主义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军队大举南下西进，进攻南洋诸国和泰国、印度、缅甸等南亚国家。在六十多年的时间里，日本不断侵略周边邻国，大肆扩张殖民统治，给东亚各国人民造成巨大灾难，成为中国、朝鲜等东亚国家的恶邻。

中华民族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随着日本侵华野心的膨胀和侵略步伐的加快而水涨船高。甲午战争虽以清政府的失败告终，但标志着近代以来

2 海峡两岸抗日小说比较研究

中华民族抗日斗争拉开了序幕。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将台湾、澎湖割让给日本，台湾从此沦为日本殖民地长达50年之久。日本侵占台湾后设立“总督府”作为最高统治机构，建立和强化警察制度、司法制度及地方保甲制度，对台湾人民实行残暴统治；攫取台湾人民土地，进行疯狂经济掠夺。台湾人民不畏强暴，持续开展反抗日本侵略和殖民统治的英勇斗争。

清政府的割台行径遭到台湾人民的强烈反对。他们除了以血书向清政府表示反对与日媾和、反对割让台湾给日本外，台湾士绅丘逢甲等人更于1895年5月宣布成立“台湾民主国”，试图以“自立”方式抵制日本侵台。其发布文告昭告天下：“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改省为国，仍隶清朝”、“事平之后，当再请命中朝，作何办理”。他们推举台湾巡抚唐景崧为总统，丘逢甲为全台义军统领，刘永福为大将军，更改官制、国旗、印信和文告，定年号为“永清”（永属“大清”之意），领导台湾人民为抗击日本侵略者而开展大规模武装斗争。唐景崧、丘逢甲领导的台湾北部和中部抗日斗争相继失败。驻守台南的刘永福拒绝被推任“民主国”总统，但以“台湾民主国”镇守台南帮办军务名义在台南恢复权力机构，发行纸币和邮票，率黑旗军与义军和新楚军协同作战，在新竹、大甲溪、苗栗、彰化、斗南、嘉义、云林和台南一带痛击日军，最终因军械粮秣俱绝，坚持抗日斗争5个月后被迫退返祖国大陆。到台南失守止，台湾军民共毙伤日寇3.2万人。此后，陈秋菊、詹振、柯铁、柯合、黄国镇、简大狮、林少猫等台湾各地抗日军民，少则数百人，多则数千人，在台北、台中、台南地区建立根据地，经常进攻日寇营房，袭击日寇官署，抗击日寇疯狂扫荡。直到1902年5月，林少猫抗日民军在“后壁林之役”被日寇剿灭，日寇侵台初期台湾大规模抗日游击战才宣告结束。

但是，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并未就此偃旗息鼓，此后台湾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转为一方面进行文化抗日，宣扬并努力保持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暴戾统治，争取政治上的合法权益。台湾知识分子更是为保存中华传统文化不遗余力，1920年留日学生创办了《台湾青年》杂志月刊，积极倡导普及白话文，1921年由台湾知识分子创立的“台湾文化协会”，后来成为台湾抗日民主运动的主力；另一方面小规模零星的武装斗争依然持

续不断,从1907年至1915年,台湾人民共举行十余次起义,其中比较著名的有:1907年11月蔡清琳发动的新竹北埔起义;1913年12月罗福星发动的苗栗起义;1914年5月罗臭头发动的嘉义六甲起义;1915年7月余清芳、江定发动的噍吧年起义等。“台人的武力抗暴招致日本殖民者疯狂的镇压和杀戮。以噍吧年事件为例,台湾人民惨遭屠杀的,约有三万人之谱,包括幼儿、妇女、老人在内。”^①台湾少数民族同胞也多次举行武装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特别是1930年台中州雾社泰雅族的“雾社起义”,捣毁10余处日寇警察所,与6000余名日寇激战20余天,杀死侵台日军134人,杀伤215人,900多名山胞献出了生命。^②日本殖民台湾50年,为抗击日寇而牺牲的台湾同胞达到65万余人,被日寇杀害的台湾同胞仅仅在最初十年中就达50万人以上,日本侵略者也付出了近卫师团长北白川宫能久亲王及以下4800多人死亡和2.7万多人负伤的沉重代价。^③台湾各族人民英勇反抗外来侵略的不屈不挠的坚强斗志和巨大牺牲光耀中华民族抗日史册。

祖国大陆的抗日战争始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1年9月18日夜,驻沈阳的日本关东军秘密派人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的一段铁路,伪造现场,诬称为中国军队所为,并以此为借口,向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进攻。接着,日军分路推进,一路由大连奔鞍山,一路由中朝边境的安东趋凤凰城,一路由吉林攻长春。由于东北军奉行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10多万东北军不战而撤,使得日军轻易在一星期内就接连占领沈阳、营口、长春、吉林等地,1932年1月3日又占领了锦州,2月5日占领哈尔滨。不到半年时间,东北全境沦陷。“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主力虽然撤出东北,但仍有一部分东北军爱国官兵坚持抗日,如黑龙江省警备司令马占山等就率部奋起抗敌,东北各地的民众更是自愿组织起众多抗日义勇军,尤其是中共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即后来的东北抗日联军)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积极抗击日寇,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等抗日烈士牺牲在白山黑水。

^① 叶石涛:《光复前〈台湾文学全集〉总序》,《台湾文学全集》,台北:远景出版社1979年版,第20页。

^② 《好搜百科:雾社起义》。<http://baike.haosou.com/doc/5614618-5827228.html>。

^③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编著:《中国战争发展史》(下),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90页。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全面抗战爆发的六年时间里,日本侵略者不断蚕食中国领土,除了在东北扶植起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外,还在华北策动“华北自治运动”,企图让华北五省在政治上、经济上完全脱离南京中央政府而独立,从而建立起第二个“满洲国”。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国民党军爱国将领蒋光鼐、蔡廷锴率19路军奋起抗击日本海军陆战队对闸北的进攻,随后日军不断增兵,在敌强我弱、国民党政府不予支持的态度下,中国军队坚持抵抗一个多月,重创日军。1933年1月起,日本关东军又侵占了热河全省,随后开始进攻长城各口,平津危急,29军、32军、17军、59军和东北军一部在喜峰口、罗文峪、古北口、南天门等与日军展开激战,是为长城抗战。1933年5月,国民党爱国将领冯玉祥联合方振武、吉鸿昌等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曾先后收复察东各县。1936年11月由关东军扶植的傀儡政权——蒙古军政府下属的王英“大汉义军”在日军顾问指挥下进犯绥远东部,绥远省主席、35军军长傅作义率部反击,取得了红格尔图大捷,收复了百灵庙。

1937年7月7日下午,驻丰台日军一部在卢沟桥中国第29军驻地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演习时,谎称有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被中国守军拒绝。日军肆意扩大事态,于8日晨突然炮轰卢沟桥和宛平城,中国守军奋起抗击,是为“七·七”卢沟桥事变。从此,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卢沟桥事变后,日寇迅速增兵华北,中国守军英勇抵抗,29军副军长佟麟阁、132师师长赵登禹阵亡,北平、天津先后沦陷。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威胁南京。国民政府被迫开始全国抗战部署。经过中共与国民党反复谈判,蒋介石被迫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国民政府正式宣布改编红军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此形成,中国全民族抗战正式开始。

中国的抗日战争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战略防御阶段,从“七·七”事变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这一阶段,国民党军队主力担负正面战场的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和东北抗日联军主要担负敌后的作战。此阶段,日军的主要作战对象为国民党军。中国

军队先后进行了淞沪战役、太原会战、徐州会战、南京保卫战、武汉会战等几次大规模防御性战役，打破了日本帝国主义“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在太原会战的忻口战役中，八路军在侧翼积极配合，国民党军在正面英勇作战，军长郝梦龄、师长刘家麒、旅长郑廷珍先后牺牲。“从‘七·七’事变到武汉失守，历时1年4个月，正面战场共毙伤日军250730人，抗击日军70万人以上，而且付出了较大的牺牲，仅正规军损失达1044268人。”^①

第二阶段为战略相持阶段，从1938年10月武汉失守至1945年8月。此一阶段，日军由于战区扩大，战线拉长，兵力不足，战略物资消耗严重，再难以施行攻城略地的进攻战略，改为战略保守。对国民党军队亦改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新四军则进行全面“扫荡”。八路军在敌顽夹击下，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先后在华北地区的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建立了四大块抗日根据地。新四军则建立了皖东、豫皖苏、皖东北、苏北及苏南、皖中抗日根据地。此间，国民党顽固派还先后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其中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民党军队包围袭击了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造成新四军伤亡7000余人，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被叛徒杀害的严重流血摩擦。此阶段，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主要作战行动有海南岛及潮（州）汕（头）的作战、南昌会战、随（县）枣（阳）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桂南会战、1939年冬季攻势、枣（阳）宜（昌）会战、上高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及中条山会战等。1940年5月16日在枣（阳）宜（昌）会战中，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亲临前线指挥作战，血战殉职。1942年5月，日军对太行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在指挥部队掩护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等机关突围转移中，不幸壮烈殉国，年仅37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配合盟军协同对日作战，中国政府还组建远征军赴缅甸配合英军作战。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远征军以阵亡26697人、伤35511人、失踪1056人^②的重大牺牲坚持作战到1945年3月胜利反攻，第200师师长戴安澜壮烈殉国。

^①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编著：《中国战争发展史》（下），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42页。

^② 《卫立煌致蒋介石电》（1944年12月18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同上书，第1021页。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了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抗日战争进入了最后反攻阶段。在日本拒绝投降后,美国于8月6日和9日先后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8月15日日本终于宣布无条件投降。

“中国抗日战争是一百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抗日战争取得的胜利是空前的,自1931年9月18日开始,到1945年9月止,在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共进行重要战役200余次,大小战斗20余万次,歼灭日军150万人、伪军118万余人。中国收回了由于不平等条约而失去的一部分主权,也收回了除香港、澳门以外的大部分失地,被列强霸占50余年的台湾、澎湖列岛等地,重新回到祖国怀抱,洗雪了民族耻辱。”^①“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伤亡380余万人,中国人民牺牲2000余万人,中国总伤亡达3500余万人。中国财产损失600余亿美元(按1937年美元计算,下同),战争消耗400余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中国在抗日战争中作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②

自中日甲午战争起,中华民族五十多年的抗日斗争历史是文学创作极重要的素材。1900年洪兴全《中东大战演义》的问世揭开了20世纪中华民族抗日斗争小说创作的第一篇章。这部小说记叙了中日甲午战争的全过程,包括战争的起因、发展、结局,尤其是台湾人民反对清政府割台、奋起抵抗侵台日军的斗争事迹,都无不加以详描细摹。而无名氏的《梦平倭奴记》则幻想日本三岛被中国军队剿平,自叙体小说《旅顺落难记》(阿伦著)借外国人的视角反映甲午战争辽东半岛沦陷后倭寇残杀中国平民的暴行。

台湾被日本占领并实行殖民统治,台湾军民最初的武装反抗逐渐平息后,台湾文坛的抗日风潮开始暗涛波涌,由于日本殖民统治的残暴,台湾抗日小说创作采取的是迂回曲折的形式:一是言此意彼的寓言小说。如台湾最早

^①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编著:《中国战争发展史》(下),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29—1030页。

^② 同上书,第1036页。

的抗日小说《台娘悲史》（施文杞，1923）就将台湾被殖民统治的悲惨境遇以寓言形式加以反映。二是表现台湾民众对于汉民族传统文化的坚决，以对抗异族的同化。赖和、吴浊流、蔡秋桐、陈虚谷、王昶雄、朱点人等众多台湾新文学的老一辈作家，他们的小说或描写汉民族集体仪式和个人家庭生活中对于汉文化的传承，或揭露讽刺那些仰殖民者鼻息数典忘祖的民族败类。三是描写日本殖民统治的残暴。赖和、陈虚谷、杨守愚、蔡秋桐、杨逵、朱点人等都有大量作品刻画了日本警察欺压台湾百姓的暴行，同时也对异族统治下一些同胞的不觉醒，提起疗救的注意。

上述台湾抗日小说由于反映的是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土地上民众隐晦的抗日行为，因而我们可以乡土抗日小说视之，以区别于军事抗日小说。大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区和华北沦陷区出现的乡土抗日小说有着与台湾乡土抗日小说相类似的境况，由于难以直接表现抗日主题，沦陷区的作家们就以“绿林造反”的故事借以讽喻。离开沦陷区的作家则义无反顾直抒胸臆描写沦陷区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武装斗争。大后方的许多作家在流离颠沛的战时生活中创作了大量反映民众觉醒及其武装抗日的小说，这些小说和抗日民主根据地作家以大众化、民族化的传统形式和明确的政治追求为鹄的、表现抗日根据地军民崭新精神面貌的小说共同汇成了战时乡土抗日小说创作的洪流。它们和同时期台湾的乡土抗日小说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随着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台湾回归祖国，海峡两岸才迎来了抗日小说创作的真正繁荣。但战后初期，由于台湾本土作家中的多数人有一个从日语写作转换为汉语写作的适应和熟悉过程，因而出现了暂时的沉寂。战后的五六十年代台湾抗日小说创作的主体是1949年前后随国民党政权退守台湾的大陆去台作家。这些作家多数亲历过抗日战争的风云岁月，但又不认同中共的政治主张，所以他们的抗战小说在反映抗日主题的同时，通常要响应当局“反共抗俄”的政治要求，在小说中穿插表现反共的内容。其中东北籍作家和所谓“军中作家”是抗日反共小说创作的主要群体。台湾本土作家在经过短暂的创作休眠期后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风云再起，老一辈和“中生代”作家纷纷推出了比较有分量的长篇巨作，这些堪为台湾抗日史诗作品的

问世标志着台湾本土作家的抗日小说创作走向了巅峰,而战后出生的“新世代”作家也从多角度多侧面表现抗日主题,有些作家在艺术表现方法有较大超越。台湾少数民族作家也推出了本民族的抗日小说,虽然作品数量少,但影响力颇大。

战后大陆的抗日小说创作热潮历久不衰。建国初期“十七年”,全社会沉浸在革命胜利的欢乐氛围中,其时的抗日小说无不洋溢着豪迈的气概,奏响着英雄主义的主旋律,内容上只表现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抗日根据地民兵游击队的敌后抗日斗争,创作方法是所谓的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相结合。虽然作品数量不少,但高度雷同,同质化现象严重。1977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为新时期的抗日小说创作营造了良好的氛围,提供了新的机遇。20世纪最后二十多年,大陆抗日小说创作异彩纷呈,一是题材的突破,摆脱了以往只歌颂共产党历史功绩的偏颇,大量反映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上抗敌故事的作品纷纷问世,特别是其中若干部全景反映抗日战争的长篇史诗巨作,对于人们全面了解和正确理解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历史作用极有助益;二是观念的更新,作家借鉴新历史主义等理论观照抗战历史,对于战争中人的命运的关注超越了以往单一从阶级论角度观察战争的狭隘视角,极大地丰富和拓宽了抗战小说的视野;三是创作方法的创新,多种现代主义艺术方法为抗战小说创作所吸收,提升了抗战小说的艺术品位。

检视20世纪海峡两岸的抗日小说创作,有必要厘清以下若干问题:

一是海峡两岸的抗日小说虽然同属于中国新文学视野下的文学创作,但是,由于两岸特殊的历史发展和现实状况,二者之间无论思想观念,还是艺术表现都呈现为异同参差,但总体是异大于同。尤其20世纪的上半叶,台湾被日本侵占为殖民地,许多台湾作家采用日文创作,虽然透露的是汉民族的思想传统和价值观念,但毕竟受到了日本殖民者一定程度的同化,而且殖民地人民的抗敌斗争和交战区人民的反侵略战争,形式和规模都不可同日而语,与此相关联的小说创作,作品内容的呈现也受各自环境的制约。20世纪下半叶,海峡两岸又由于执政党曾经高度敌对,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处于彼此隔绝和互不交流的状态,这对同题材的小说创作不免产生深刻的影响,不仅彼

此的政治观、历史观南辕北辙，连现代汉语这一共同采用的文学语言都呈现出艺术表达上的鸿沟。基于此，本书在对两岸抗日小说创作进行比较时，尽可能选择可资比较的作品，即两岸在同一历史时期都曾经共同呈现过的创作现象，如战时两岸乡土抗日小说、战后两岸从军事政治角度表现抗战历史的小说、战后反映两岸抗日历史的史诗性的抗日小说等，对于不便进行比较属于一方独有的创作现象则予舍弃，如战时大陆表现国军抗战题材的小说和台湾反映台籍日本兵在南洋战争中不幸命运的小说。为弥补缺憾，笔者将两篇相关论文作为附录列后。

二是本书所谓抗日小说是指那些以抗日斗争为题材，以表现武装抗日或其他形式反抗日本侵略（台湾则为殖民统治）为主题的小说作品。至于那些以抗战为时代背景，但并不以抗日为主要内容，虽然局部内容涉及抗日的小说，我们并不把它们作为抗日小说看待，不列入本书的论述范畴，如台湾所谓“四大抗战小说”：王蓝的《蓝与黑》、潘人木的《莲漪表妹》、纪刚的《滚滚辽河》、徐钟佩的《余音》。这四部小说，除了《滚滚辽河》通过所谓“工作线”（地下抗日工作）和“爱情线”双线并进，叙说主人公为了抗战而牺牲爱情的故事，算得上抗日小说外，其余三部作品，并不以抗日为主旨，而是表现在抗战的时代大背景下，大后方的新闻工作，或大学生校园生活的点点滴滴，或家庭人事变迁和爱情、婚姻生活等，并且这几部作品都夹杂着作者浓厚的反共情绪，与其称它们为抗战小说，不如视它们为反共小说更恰如其分。

三是本书所阐述的作品时间下限为 20 世纪末，这是受海峡两岸抗日小说创作的现实情形所制约。众所周知，台湾自“解严”后实行所谓民主制度。随着国民党威权体制的崩溃，连同国民党在大陆曾经创立的抗日功绩也逐渐不被台湾社会提起，尤其是近二十多年，台湾日据时期小说研究中粉饰昔日“皇民文学”，为“皇民文学”翻案的逆流甚嚣尘上，如台湾曾作为“战斗文学”的始作俑者的彭歌，近年来就大肆叫嚷：“反皇民化，就是赤化台湾”，“对台湾的叛卖”。连昔日曾认同“台湾一直是汉民族文化圈子内不可缺少的一环”的叶石涛近年在其《台湾文学本土化是必由之路》等文章中，竟大变脸说中国文学“是具有沙文主义的大汉文学”，是“强权文化”与“异质文化”、“台湾文学不隶属于中国文学”，是“自立自主意识的文学”。在以极力鼓噪“本土化”为幌子的“台独文学”日益猖獗下，加上台湾社会始终

存在着留恋甚至美化昔日日本殖民统治的潜流,因此,台湾的抗日小说创作从 20 世纪 80 年代后便渐趋式微,几无有影响的新作品问世。^①而大陆抗日题材的小说和影视创作热潮却一浪接一浪至今火爆。作为一种文学的比较研究,一旦双方的创作力量失衡,一方陷入创作困境,无新作品问世,便失去了比较的基础和意义。也许,由于我们受文学文化交流的主客观条件限制,不了解台湾近年来的抗日小说创作与研究状况而得出了上述偏颇甚至错误的结论。但愿如是。

^① 2004 年由魏德圣执导反映台湾原住民“雾社起义”的电影《赛德克·巴莱》上映,由电影改编的同名小说于当年 10 月出版,是台湾进入新世纪后罕见的抗日文学作品。鉴于其为个案且超出本研究阐述的时间范围,本书未述及。

上 篇